

THE WORLD IS

为天 公下

EQUALLY SHARED BY ALL

中国共产党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书试图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
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零碎地、
哲学地而不是常识地考察、分析、思考

从学理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田鹏颖
武雯婧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WORLD IS
EQUALLY SHARED BY ALL

天下为公

中国共产党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田鹏颖 武雯婧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田鹏颖，
武雯婧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2019.6重印）
ISBN 978-7-5201-3154-4

I. ①天… II. ①田… ②武…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8983号

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著 者 / 田鹏颖 武雯婧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程丽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54千字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4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154-4

定 价 / 7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
《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

前 言

2018年，是伟大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大路奉献给远方，白云奉献给蓝天……”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拿什么奉献给马克思，用什么纪念改变世界的《共产党宣言》，思考中，我们选择了撰写《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16年，东北大学党委书记熊晓梅教授送我一本书《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并指示我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本京沪青年学者直面“中国问题”，深入理性思考而成的论著。一看这部论著的标题，在我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不正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吗？



从西方到东方、从传统到现代、从理念到实践，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超越民族、国家、区域，超越一国之利和一己之私，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贡献“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中国理念”，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话语”，这一话语自提出以来逐渐受到世界青睐，2017年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决议，已经正在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世界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包含着理念和实践的双重意蕴，既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意识，表现为平等权力观、正确义利观、整体安全观、新型文明观、绿色生态观的有机统一，又表现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合作机制、推进新型大国外交的具体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进行时，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逐渐增多，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呈现出多重视角，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具体、生动、鲜活的形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正在改变着世界。

而要探究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什么，就需要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而不是肤浅地、全面而不是零碎地、哲学而不是常识地考察，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从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从马克思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出发，从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使命出发，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语境，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结果是世界各国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同体，资本逻辑是推动和维持这一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建立在人类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想，而是对人类社会客观事实的理论自觉，但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没有成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文明新纪元，从人类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现代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方向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充分利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

二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探讨和把握提供了研究的一条主线，本书围

绕这条主线，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的辩证统一中全面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该往何处去”历史课题的时代答案进行全面解读。

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境遇是人类社会面临共同危机和挑战。习近平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①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为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创造条件。

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背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进而带来一个“西化的世界”，一个带着“血和肮脏”的世界，一个充满“冲突和对抗”的世界，如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浪潮升温，普遍出现“自顾”“内顾”倾向，无益于人类社会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全面升级的过程中开辟一个包容的时代。在政治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使国际秩序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协调冲突，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建设者和引领者转变，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从外交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从区域走向世界，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人类社会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古文明，与其所具有的包容特质关系密切，在与世界文明进行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始终尊重文明差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指出：“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超越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50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544页。

“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新范式”，从而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三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挫折与低谷之后，重新绽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重新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站在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立场上，所以共产党人不可能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必然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致力于人类共同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①2017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擘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呼吁各国人民和政党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升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直面现实，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57页。

度、两种价值、两种文明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认两种制度的差异，命运共同不等于制度共同，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消解，而是在两者并存的阶段，既尊重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和历史创造，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人类社会中的创造性和优越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公有、共享、和谐、包容特质，主动作为，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向前进步和发展，致力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未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大同社会的美好设想，蕴含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世界大同的理念，这一理念正在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的推进而逐渐成为现实，以实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①的良好愿景。从19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从欧洲到中国，从马克思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没有现成的建构模式，必然面临不断变化的时代课题，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也将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540页。

目 录

第一章 文明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第一节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1
第二节 文明冲突论的焦虑	10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范式	23
第二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5
第一节 全球化 1.0：古代丝绸之路	35
第二节 全球化 2.0：西化的世界	46
第三节 全球化 3.0：包容的世界	57
第三章 共产党人的使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68
第一节 “自由人联合体”	68
第二节 造福人民	79
第三节 共建共享	91
第四章 科学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04
第一节 千年一叹.....	104
第二节 东方大国.....	115
第三节 谋天下.....	127

第五章 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39
第一节 全球危机	139
第二节 “中国方案”	150
第三节 改变世界的力量	162
第六章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74
第一节 “修昔底德陷阱”	174
第二节 世纪之问	185
第三节 求同存异	196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07
第一节 “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之争	20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谁主沉浮”	218
第三节 “中国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29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44

第一章 文明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样态，这些文明经历了形成与变迁、延续与中断、保存与覆灭的历史境遇。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谱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历史命运。文明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文明碰撞的历史，“在 20 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① 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当今时代，西方学者将人类未来的竞争定位于文明的冲突，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在中华文明孕育下的当代中国，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文明交往范式是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相结合的美好愿景，是对西方学者“文明冲突论”的超越。

第一节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原生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没有断裂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实践谱系经常紧密地结合，它们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基层，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第 32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 258 页。

因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自我再造能力”。^① 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实践谱系是中华文化价值理念的承载实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哲学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关系的思考。这一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世界观。“天”即宇宙自然，天地万物都遵循一定的规律，保持本真的和谐状态。“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一样的，人要与自然一样，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契合和对“自然”的效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立于此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人生观是：道家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自然，“万物与我一”，人要冲破现实生活对人性的束缚，进而在回归自然本性时解放人性。儒家认为人修行的目的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实现“天人合一”的方式在于德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修行，对生命本性有所体悟，进而达到道。由此而引申的价值观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应该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拥有高尚德行的人不仅能追求自身的领悟，而且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对自身的约束，提升个体的道德水平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主张以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力量来实现有序的状态，每个人都追求至善，推己及人，不同个体之间就能和谐共存。

“天人合一”体现在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中表现为“仁政”的王道。从儒家思想来看，政治治理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自由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靠的是恐怖和暴力。”^② 儒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为王，因为“圣人”称谓代表拥有高尚的道德。圣王的治道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不以取得多少土地、扩大多少疆域为目标，而要以道义、德治的力量促进天下善治与世界和谐。“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国内政通人和，

^① 姜义华：《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22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74页。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天下为公”的世界意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施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一种充满仁爱、公平、幸福、和睦的和谐社会，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拥有高尚的道德，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每个人都能在“社会共同体”中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一定意义上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中看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一些根本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和谐本真状态的追寻本身体现着不同之中的共同。自然界万物是不同的，却处于有序的生存状态，彼此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从这个前提出发，儒家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和谐并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在对立中的统一，老子的辩证法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和谐的状态。与此相反，西方文明从大自然的状态中看到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线性进化观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看到的是对立，是不同。孙中山曾强烈地批评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一些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要建立在牺牲和侵略另外一些民族的基础之上，彼此之间只有利益之争。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本位。个人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个人德行的追求上，反对物我二分、人我二分、身心二分，更多地强调人对精神和智慧的追求。西方的文化是推崇个性的文化，但是这里的个人，例如洛克、亚当·斯密追逐自利的“经济人”和边沁所鼓吹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只关注利益的个人，人与人之间因为逐利而处于竞争的状态，物我、人我处于分离的状态。儒家认为，人性高于动物性的地方在于人有德行，知道自我节制，这样的人才能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个人要追求自身的正当利益，但更重要的是，面对“利”与“义”的诱惑和选择时，能够约束自身，而不是任由其摆布。有人责难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湮灭了个人，因为个人要服从集体，然而，从德文化上来看，个人要发挥其在集体中的作用是因为从根本上来看人与集体（所处的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个人在集体中并没有湮灭个性，而是认识到了个人对于和谐状态的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家、国、天下，“异位同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文化反对为了和谐而附和，认为真正的和谐状态是建立在尊重差异性和特殊性基础之上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之道。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化解这种内在的不和谐状态？一方面是通过涵盖整个社会规范的礼来维持秩序。每个人所处的角色、位置和等级决定了这个人应该遵循的礼仪规范。“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生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让人们知道如何把握待人处事的度，进而维持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的和谐有序。另一方面就是主张和推行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儒家实行“仁政”的方法在于推行“忠恕”之道。“尽己为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也就是个人自觉地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个人这样做，纯粹是因为对道德的追求，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强制。墨家主张“兼爱”，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无差别地、同等地去爱别人，因此反对战争（“非攻”），主张选拔有才能（道德）的人来管理国家（“尚贤”）。

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东方文明的精髓。从构成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来看，“和”“合”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处世哲学。在中华文明的基因里，从根本上排斥战争、冲突的无序状态，始终为百姓生活的安宁寻求安稳之道。由此形成的注重个人实践历史的知识谱系、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谱系、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谱系和互帮互助的社会自我治理实践谱系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

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以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① 中华文明本身经历了文明的冲突和交融，但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最终打破了地域和族群的界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共同体。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族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同化作用明显，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同时也不丧失自身的主体地位。在历史上，先后活跃于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有氐、羌、月氏、乌孙、匈奴、东胡、肃慎、夫余、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畏兀儿、回族、满族等，先后活跃于西南地区的有藏、彝、傣、苗、黎、壮等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与主体农耕文明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彼此融合为一个整体。事实证明，只有更好地融入主体文化中，多种文化才能实现共生共存。以元朝和清朝为例，蒙古族统治中原时的元朝，排斥对汉主体文化的学习，试图以游牧文明完全压倒农耕文明，以文明的对抗来维持文明的胜利，在把人划分成的多个等级中，汉族处于末位，最终元朝不足百年而亡；清朝在文化上十分推崇对汉文化的学习，乾隆皇帝精通汉语、蒙语、满语，清朝皇帝基本都精通汉语，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经过交流、合作、冲突、认同、联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这一过程本身培养了中华文明吸收、容纳、包容多样文明的基因，形成了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文明血脉。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了中华文明自我适应、自我超越的能力。

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历史悠久。公元前 100 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唐代处于对外交流的活跃期，都城长安聚集了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和留学生，大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化传入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达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明末清初，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知识传入中国，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南美洲土豆、番薯、

^① 姜义华：《世界文明视阈下的中华文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 11 页。

玉米的引入，使粮食供给大大增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中华文明不断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融合，和谐共生。

当然，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冲突和碰撞，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能力化解了这种挑战。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时并没有顺利地展开，而是经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中大乘的律宗、三论宗、禅宗、涅槃宗等，小乘的俱舍宗、成实宗，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外来文化只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上，才能更好地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存。

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融合在第一阶段表现为中华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交流，促进了中华文明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第二阶段表现为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深度融合，但中华文明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第三阶段，中华“农耕文明”日渐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有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也有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谱系完全不同的价值理念，比如个人本位、经济利益至上、功利主义，这时中华文明采取的态度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不同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知识谱系、责任伦理价值谱系、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实践谱系，中华文明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来充实和提升自己，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强调以华夏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准，而不是血缘和地域。血缘是不可改变的，地域的稳固性也较强，如果以血缘和地域为划分标准，就容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限制和割裂了其他民族与作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的融合。在儒家看来，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韩愈评价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在行为上符合中国文化的礼仪规定，就可成为华夏。“夷夏之辨”的重点在于促进协和和融通，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价值体系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相比于通过战争征服来强制其他民族接受新的价值理念，文化交流更注重内在的选择性，影响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文化和文明存在差异、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分，